

# 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

乌宗玲

灵验记中佛经感应故事数量众多、历时久远，盖可推见佛典信仰之兴盛。灵验记是中国僧俗编撰的，深受大乘佛教尊经倾向的影响，不同于原始佛教的语言崇拜。追溯其根源，则是中土很早就形成的文字（典籍）崇拜。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实使中国文化，特别是佛教文化产生莫大之变化。

关键词：灵验记 佛经 文字 信仰

作者：乌宗玲，1979 年生，重庆三峡学院讲师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。

佛教灵验记，又称感应记、感应传、感通记、冥报传等，是指向佛、菩萨祈祷、忏悔或念佛、诵经、造经、造像后出现感通、灵异诸神异事迹的记述。<sup>①</sup>以因果报应思想为理论基础，“大抵记经像之显效，明应验之实有，以震耸世俗，使生敬信之心”。<sup>②</sup>魏晋时期的佛教小说已多见佛经感应故事，后世此类故事不绝如缕，其出处亦相当广泛：一者僧人传记和佛教历史书，如梁慧皎《高僧传》、唐释道宣《续高僧传》、宋释志磐《佛祖统纪》等；二者类书之佛经灵验故事，如唐释道世《法苑珠林》、北宋李昉等《太平广记》；三者佛教灵验故事集，如唐释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、宋非浊《三宝感应要略录》等；四者某部佛经的灵验故事集，如《金刚经》的有唐孟献忠《金刚般若经集验记》、明王起隆《金刚经新异录》、清王泽洙《金刚经感应故事分类辑要》等，《法华经》的有唐惠详《弘赞法华传》、宋宗晓《法华经显应录》、清周克复《法华经持验记》等，《华严经》的有唐法藏《华严经传记》、清弘璧《华严感应缘起传》、清周克复《华严经持验记》，《观音经》的有刘宋傅亮《光世音应验记》、清周克复《观音经持验记》，《弥陀经》的有清徐槐廷《弥陀经应验》，《金光明经》的有明受汰《金光明经感应记》等；五者散见于笔记小说中的佛经灵验故事；六者抄于敦煌佛经之前的灵验故事，如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》、《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》、《黄仕强传》等；七者其他书籍的佛经感应故事，如《金刚般若经偈会本》附有 12 则受持《金刚经》的感通故事，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十录有 37 则佛经感应故事。关于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，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，如刘亚丁《佛教灵验记研究》、<sup>③</sup>黄东阳《唐代〈金刚经〉应验故事抉微》、<sup>④</sup>何佳玲《明清金刚经灵验记之研究》、<sup>⑤</sup>郭

① 郑阿财《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》，李志夫主编《佛学与文学——佛教文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（文学部份），法鼓文化，1998 年，第 121—152 页。

②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团结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37 页。

③ 刘亚丁《佛教灵验记研究》，巴蜀书社，2006 年，第 183—243 页。

④ 黄东阳《唐代〈金刚经〉应验故事抉微》，第 177—189 页，《北商学报》第 8 期，2005 年 7 月。

⑤ 何佳玲《明清金刚经灵验记之研究》，国立中正大学，2002 年，第 179—180 页。

迎春《〈涅槃经〉无量功德的宣化与信仰》<sup>①</sup>等，上述论著各自探讨了某个时期或某种佛经的感应现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除郭迎春之文略及《涅槃经》感应故事与《涅槃经》对经书功德的宣扬有关之外，上举其余各文关注佛经感应本身却对其产生的原因鲜少着墨。此外，关于佛经感应故事的影响，唐道宣早即言“光瑞出没，开信于一时。景像垂容，陈迹于万代。或见于既往，或显于将来。昭彰于道俗，生信于迷悟。”<sup>②</sup>陈寅恪先生亦谓“至《灭罪冥报传》之作，意在显扬感应，劝奖流通。”<sup>③</sup>仅有周绍良、郑阿财、杨宝玉等先生的研究继其踵，然所给予的评价较之陈氏和道宣等，却未免狭小。要言之，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实使中国文化，特别是佛教文化产生莫大之变化。故笔者拟在前贤时彦所论基础上，对此信仰产生原因和其影响，试作探讨。

## 一、灵验记中佛典信仰产生之原因

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中国民众最信仰“有求必用”的神，佛教之所以为中国民众所接受，最大的因素就是现实利益。<sup>④</sup>灵验记对佛经神力和崇奉佛经功德的无限夸大，应是佛教界的僧人为振兴佛教，“诱导世人信佛念经、行善断恶”。<sup>⑤</sup>但这种对佛典的崇拜，更深层的原因应是大乘佛教本身的宗经倾向。如日本学者水谷幸正云“在阿含经典中最后以闻法者欢喜奉法作为说示的终结，而大乘教典则强调对经典受持、读诵、解说与书写的功德，努力向大众传播流布，为其使命”。<sup>⑥</sup>印顺大师谓大乘佛法开始流行时，写经即是佛教界的新情况。经书的书写、供养、布施成为功德而被高度赞扬。并认为大乘佛教以经书为中心是对甚深经法的通俗化，类似一般低级的神教。<sup>⑦</sup>笔者查阅各种大乘佛经，崇奉经书的功德确实被大力宣扬。

如《金刚经》云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“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”，“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，皆应供养。”“受持读诵者，当成就‘最上第一稀有之法’”。又“广为人说者”，成就“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无边无量功德”和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。<sup>⑧</sup>崇奉佛经的意义与功德，《妙法莲花经》也作了强调，和《金刚经》相比，尤有过之。如卷六“法师功德品”云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是《法华经》，若读、若诵、若解说、若书写，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、千二百耳功德、八百鼻功德、千二百舌功德、八百身功德、千二百意功德。以是功德，庄严六根，皆令清净。”<sup>⑨</sup>反之，“其有诽谤如斯经典，见有读诵、书持经者，轻贱憎嫉而怀结恨”者，命终后入阿鼻地狱，无数劫后从地狱出当堕畜生道，转而为人也将受贫穷、恶疾、愚钝、丑陋等楚毒。<sup>⑩</sup>

《大般涅槃经》中亦宣扬受持佛经具有极其重大的宗教意义与现实功德。其书卷六云“若有

① 郭迎春《〈涅槃经〉无量功德的宣化与信仰》，项楚主编《中国俗文化研究》第四辑，四川出版集团·巴蜀书社，2007年，第162-167页。

② (唐)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2册，第404a页。

③ 陈寅恪《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57页。

④ [日]镰田茂雄著、关世谦译《中国佛教通史》第1卷，佛光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7-29页。

⑤ 杨宝玉《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5页。

⑥ (日)水谷幸正《初期大乘经典的成立》，张曼涛主编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第98册，大乘文化出版社，1979年，第55页。

⑦ 印顺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正闻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13-114页。

⑧ (后秦)鸠摩罗什译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750-751页。

⑨ (后秦)鸠摩罗什译《妙法莲花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9册，第47c页。

⑩ (后秦)鸠摩罗什译《妙法莲花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9册，第47c页，第15-16页。

众生于八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，受持、读诵、书写经卷，亦劝他人令得书写”，“供养是经，亦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，读诵礼拜亦复如是”，如此之人即会受到正法受持拥护。但不信佛经者则会遭遇今世和来生的诸多不顺“若有不信是经典者，现身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，多为众人所见骂辱。命终之后，人所轻贱，颜貌丑陋，资生艰难，常不供足，虽复少得，龌龊弊恶，生生常处贫穷下贱。”<sup>①</sup> 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法苑珠林》卷一七《敬法篇·谤罪部》<sup>②</sup> 和《诸经要集》卷二《敬法篇·谤法缘》<sup>③</sup>，把《大集经》、《大般若经》、《大品经》等有关污浊、损毁、脱落和诽谤大乘经典者将获盲报、堕入地狱道或畜生道等果报的经文汇编在一起，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灵验记以惩罚手段来威慑诋毁佛经者，实受大乘佛经的影响。大乘佛教这种经典崇拜（文字崇拜），不同于原始佛教的语言崇拜。佛教产生之初，释迦牟尼为了吸引广大的下层群众，采取的是口耳相传、以诗偈为中心的弘法形式。如《分别功德论》卷二云“外国法师徒相传，以口授相付，不听载文。”<sup>④</sup> 先贤梁启超亦指出初期中国所译印度佛经，率无中土观念的原本，但凭译者背诵而已。所说良是。但梁先生推测印度无写本的原因一是古代竹帛不便传写，二是含有宗教神秘的观念，认为书写读经。<sup>⑤</sup> 其观点忽略了印度佛教崇拜声音的习俗。张子开先生《试论印度佛教的说法方式》一文指出印度佛教在弘法之初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，是“深受以口耳相传形式的《吠陀》之类宗教文献、格言谚语以及民间说唱艺术等的影响”。<sup>⑥</sup> 结集后的佛经亦遗留了原始佛教说法方式的痕迹，《杂阿含经》卷一五“三八〇”条到“三八八”条表面上是不同文本，实是多个闻法者对同一次说法的不同记忆。“三八〇”条云“有四圣谛，何等为四，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”。“三八一”条到“三八八”条在上述文字上的基础上略有增加，如“三八一”云“有四圣谛……若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修无间等，起增上欲，方便堪能，正念正知应当觉”。<sup>⑦</sup> 要论之，原始佛教对于声音是非常尊崇的，原始佛典没有中土意义的“定本”，是口耳相传，以用于歌唱的偈颂为中心，因时地人的不同会略有差异。另据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四“西方学法”条云“咸悉口相传授，而不书之于纸叶”。<sup>⑧</sup> 因此，7世纪时印度佛教文献的传播方式仍主要是师徒间的口耳相传。大乘佛经的弘布人间，和印度的贵霜王朝有密切关系。日本学者水野弘元认为大乘经典中，最早强调书写经典功德的是公元一世纪成立的《小品般若经》。因此可知在公元1至2世纪时，已有大乘经典的书写。<sup>⑨</sup> 这个时期，正好由贵霜王朝统治印度。1996年，在阿富汗巴米扬（Bamiyan）地区发现了13捆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写卷。据邵瑞琪教授鉴定，其中部分是用犍陀罗语书写的佛教三藏，抄写年代约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初，相当于我国西汉末到东汉初年。这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经。<sup>⑩</sup> 目前，这批文献大部分归于挪威富商兼收藏家斯奎因（Martin Schøyen），并已陆续出版了由颜子伯（Jens Braarvig）主编的《斯奎因收集品中的佛

①（后秦）昙无讖译《大般涅槃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12册，第398-399页。

②（唐）道世《法苑珠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39页。

③（唐）道世《诸经要集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15b-16a页。

④佚名《分别功德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5册，第35页。

⑤梁启超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38页。

⑥张子开《试论印度佛教的说法方式》，《中国俗文化研究》第二辑，第154-163页。

⑦（刘宋）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含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册，第104a-b页。

⑧（唐）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229b页。

⑨〔日〕水野弘元著、香光书乡编译组译《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》<http://www.xin-yuan.com/cityzen/jiangtan/ahan/sanlun/1.htm>，《香光庄严》七十期/1991年6月20日

⑩林梅村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17页，第118页。

教写本》第一、二、三卷。<sup>①</sup> 据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三云贵霜王朝之迦腻色伽王召集了最后一次大型的佛典结集，此次大会结集的佛典有三藏与注释书，而且还将《大毘婆沙论》等刻写成文字：“迦腻色伽王，遂以赤铜为鏤，镂写论文，石函缄封，建窣堵波藏于其中。”<sup>②</sup> 由上可见，贵霜王朝对书写佛经已相当重视，大乘佛教的文献崇拜即是受此时代风气的浸染。

贵霜王朝这种时代风气，迥异于佛陀时期之语言崇拜，亦有别于7世纪义净所看到的印度佛教传播方式。追溯其原因，应和建立贵霜王朝的月氏人有关。月氏人西迁接受了当地和希腊文化之后，仍会留下中国文化的一些痕迹。再加之张骞通西域后，大月氏人与中原王朝之间交往频繁，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。东汉时期的佛教东渐，与大月氏人有密切的关系。两汉中国与月氏之交通，即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也。但文化交流是双向的，中土在接受佛教文化时也把汉文化带到了印度，如《史记》卷一一六《西南夷列传》载“元狩元年，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，言居大夏时，见蜀布、邛竹杖。使问所从来，曰‘从东南身毒国。可数千里，得蜀贾人市。’”索隐引《汉书音义》谓身毒即天竺。<sup>③</sup> 又《史记》卷一二三《大宛列传》云“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，在妫水北”。正义引万震《南州志》曰“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，地高燥而远。国王称天子，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，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”。<sup>④</sup> 有人指出国家君王称天子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，将贵霜王之“天子”称谓看成是中国的产物是一点也不为过的。<sup>⑤</sup> 1979年在阿富汗西北发现了大月氏王陵，其墓出土了西汉宣帝至平帝年间的昭明镜。<sup>⑥</sup> 中土文字崇拜源远流长，见于记载的文字崇拜神话始见于西汉。据《淮南子·本经》载“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高诱注“鬼恐为书文所劾，故夜哭也。”<sup>⑦</sup> 这种来自文字的奇特效果和巨大力量，反映了先民对文字的崇拜心理。可见，中土文献的经典化在汉代已完成。故中土的文献崇拜之于贵霜王朝的影响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对字纸的信仰是中土文字（典籍）崇拜的一种发展形式。此信仰认为有字的字纸或字书为神圣之物，不可随意扔弃或践踏，否则会遭报应。而若有人珍视礼拜字纸，则会得到字纸的恩惠好报。世俗文献中关于敬惜字纸的最早记载见于《颜氏家训·治家》：“吾每读圣人之书，未尝不肃敬对之；其故纸有《五经》词义，及贤达姓名，不敢秽用也。”<sup>⑧</sup> 至于佛教界的字纸信仰，则是唐释道宣所述《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》之上厕法第十四，其中要求僧人“常具厕筹，不得失阙”，并规定“不得用文字故纸”。<sup>⑨</sup> 值得注意的是，明清两代的灵验故事出现了多则糅合佛经崇拜和字纸崇拜的故事。情节最曲折的当属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之《世香客莽看金刚经，出狱僧巧完法会分》。该故事开篇即云“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或置长流清净处，自然福禄永无穷。”把字纸和佛经等同起来，认为爱惜它们皆会赢得无穷的福报。故事讲述的是嘉靖年间太湖洞庭山一佛寺藏有白居易手写的百卷《金刚般若经》，某年饥谨，寺中断炊，僧悟辨

① Jens Braarvig (ed.), *Buddhist Manuscripts*, vol. I: *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*. Oslo: Hermes Publishing, 2000. Jens Braarvig (ed.), *Buddhist Manuscripts*, vol. II: *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*. III. Oslo: Hermes Publishing, 2002. Jens Braarvig (ed.), *Buddhist Manuscripts*, vol. III: *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*. IV. Oslo: Hermes Publishing, 2007.)

② (唐)玄奘、辩机著，季羨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333页。

③ (西汉)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995-2996页。

④ (西汉)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995-2996页，第3161-3162页。

⑤ 王宏谋《贵霜帝国及其与两汉的关系》，西北师范大学，2004年，第28页。

⑥ 林梅村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17页，第118页。

⑦ 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571页。

⑧ 王利器《颜氏家训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55页。

⑨ (唐)释道宣《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5册，第873页。

以此镇寺之宝去向相国府的都管当了五十石米。笃信佛法的相国夫人得知此事后，命将此经奉还寺庙。寺中僧人取经返回，在船上众人要打开看此经，不料一阵大风吹走了第一页。后来贪婪卑劣的柳知州，嘱盗诬告该寺为窝藏盗犯之所，借以夺取寺中收藏的《金刚经》。可当他发现该经残缺第一页赚不了钱，便归还了经书。一不识字打渔老者拾得从上天伴着火光飘来的这一页佛经，因他平时爱惜字纸，“不敢褻渎，将来粘在壁间，时常顶礼。”并且在火光的指引下，寺中僧众找回了丢失的第一页佛经。此老者后梦见韦驮尊天来对他道“汝幼年作业深重，亏得中年回首，爱惜字纸。已命香山居士启汝天聪。又加守护经文，完成全卷，阴功更大，罪业尽消。来生在文字中受报，福祿非凡。今生且赐延寿一纪，正果而终。”<sup>①</sup>此故事是以《金刚经》存亡得失为推动情节发展的，以传统灵验记崇经得福为其主题。故事中字纸信仰与佛典信仰的有机融合，反映了中土文字（典籍）崇拜在灵验记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深入地影响了灵验记的编撰。

## 二、灵验记中佛典信仰之影响

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，实使中国文化、特别是佛教文化产生莫大之变化。首先此信仰促进了佛经的流通，其最著者，当属敦煌写本灵验记故事。此类故事盖抄于经文之前，如《黄仕强传》抄于《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》前，《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》抄于《金光明经》前，回鹘文的《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》抄于《金刚经》前，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》十九则故事抄于《金刚经》前。由此观之，佛经灵应故事率多为佛经传播而编撰。学术界对此多有揭示，周绍良先生《小说》一文即言灵验故事《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》放在《金光明经》卷首，并有多个抄本，反映了灵验记的编者撰集这种传说，主要是诱导人们阅读《金光明经》。<sup>②</sup>郑阿财先生进一步指出敦煌写卷灵验故事与经文字体相同，行款一致，似视故事与经文为一体，其互为表里的作用极为明显。<sup>③</sup>灵验记在佛经的流通和传播方面功不可没，但也促使中土佛教愈加世俗化和功利化。佛教的经，本是用以指导信徒究明义理、养成佛性的。灵验记处处标榜佛经灵验却不顾持经者是否理解经文要义，其关心的不是持经者对佛经义理的体悟和个体生命的精神超越，而是将佛经神灵化使其成为万能的祈愿法器。民间写经、刻经之题记，可概见此影响。如甘博0二三《妙法莲华经·安乐行品》董处亮写经题记云“为身患，写此经”。<sup>④</sup>安岳卧佛院71号窟刻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和《般若波罗蜜心经》，其题记云“遂州长江县杨思慎为亡父杨敬宗、亡母袁张宝敬造供养。”<sup>⑤</sup>此外，为超度亡灵和祈求得子之诵经，亦是受灵验记中佛典崇拜的影响。据宋王楙《燕翼贻谋录》卷三“丧葬不得用僧道”条云“丧家命僧道诵经，设斋作醮作佛事，曰‘资冥福’也。”<sup>⑥</sup>又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一五《事部三》谓“有《白衣观音经》，云专主祈嗣生育之事。”<sup>⑦</sup>要言之，民间写经、刻经、诵经等活动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，对佛经的崇拜纯粹是为了祈福求利。

灵验记和大乘佛经皆宣扬佛经是神圣的，更改、污浊、损毁佛经会有诸多报应，故古代佛经

①（明）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上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-20页。

② 周绍良《小说》，颜廷亮主编《敦煌文学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82页。

③ 郑阿财《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》，李志夫主编《佛学与文学——佛教文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（文学部份），法鼓文化，1998年，第121-152页。

④（日）池田温《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》，大藏出版株式会社，1990年，第560页，第378页，第372页，第224-225页。

⑤ 曹丹《安岳卧佛院卧佛刻经与题记》，《四川文物》，1990年（2期），第51页。

⑥（宋）王楙《燕翼贻谋录》，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（五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606页。

⑦（明）谢肇淛《五杂俎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04页。

的习读、诵持、书写、收藏、借阅佛经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如《沙弥尼律仪要略》“习学经典”条即曰“不得汙手持经卷，不得口吹经上尘，不得案上狼籍卷帙，不得经案上包藏茶末杂物。对经典如对佛。不得借人经看不还及不加爱重，以至损坏。不得笑经语。凡读经律时，先礼拜经律三拜，放双手请卷于案。将开卷，先必合掌诵开经偈。掩卷已，仍请供佛像前，作礼三拜乃却。读经律案，应净洁焚炉香。不得沙弥尼律仪放大乘经上，不得以帽置经律卷上。不得二人戏笑读经律。读经不得抚案、曲身、翘足、累踝，不得高声动众，不得卧读出声”。<sup>①</sup>《沙弥律仪要略述义》卷二除了上述规定外，还要求“凡经籍损坏，宜速修补”，原因是“经籍，即经典也，乃圣贤之血脉，亦吾人之父母”。<sup>②</sup>为保证佛经的准确性和神圣性，佛经的抄写一般都要经过校勘，这从敦煌的写经题记可看出。如S. 4153《维摩诘经》卷下题记“申年四月五日，比丘洪济共福胜，点勘了。”<sup>③</sup>又北霜字一八《大般若经》卷四百九十题记“昙真勘。”<sup>④</sup>有些佛经甚至要经过多人的校勘和审阅，如S. 2181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二题记云“上元三年四月十五日群书手杨文泰写，用纸二十张，装潢人解集，初校会昌寺僧玄福，再校会昌寺僧藏师，三校会昌寺僧儒海，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，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，详阅太原寺主慧立，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，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，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”。<sup>⑤</sup>佛经的收藏由“藏主”负责，其具体职责有：掌管经橱钥匙“夏季风日暄明，晾晒诸经”；“收橱时，查理字号，不可紊乱”；“凡请看者，须登牌，某月某日某人请某字函经”。换新的“藏主”，对寺内所藏佛经检点清楚，若有佛经缺失原“藏主”须赔偿。遗失经书者被罚抄经，而且数倍于丢失之佛经。<sup>⑥</sup>

灵验记的佛典信仰，在社会文化方面还有诸多影响。比如此信仰是疑伪经（或中国佛经）产生的原因之一。郑阿财先生谓通过佛教灵验记的鼓吹，使得疑伪经更加普及和深入。<sup>⑦</sup>佛经的神圣性，催生出金字经、血经、石经等特殊的佛经。《观音经》和《法华经》灵验故事的弘传，亦为观音和普贤信仰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灵验记对佛经神力的宣扬，在明清时期还发展出对灵验记书籍的崇拜。

总而言之，灵验记是中国僧俗编撰的，深受大乘佛教尊经倾向的影响，不同于原始佛教的语言崇拜。追溯其根源，则是中土很早就形成的典籍崇拜。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相当兴盛，影响亦相当深远。此信仰实影响了中国文化，特别是佛教文化的诸多方面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夏年）

①（清）读体辑集《沙弥尼律仪要略》，《卍新纂续藏经》第60册，第444c页。

②（清）书玉科释《沙弥律仪要略述义》，《卍新纂续藏经》第60册，第315a页。

③〔日〕池田温《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》，大藏出版株式会社，1990年，第560页，第378页，第372页，第224-225页。

④⑤ 池田温《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》，大藏出版株式会社，1990年，第560页，第378页，第372页，第224-225页。

⑥（清）仪润《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》，《卍新纂续藏经》第63册，第444b页。

⑦ 郑阿财《敦煌疑伪经与灵验记关系之考察》，《汉语史学报专集》第3辑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83-291页。